**人、地与规划的相遇：城市发展中的理念与冲突**

**——《明日之城》阅读报告**

社会学系 徐毅萌 1700016801

**一、引言：记者与规划师之争**

城市并非是一个全然年轻的概念，但随着19世纪以降欧美城市的兴起，使得城市生活逐步成为全球现象。人与地方的剧烈的相遇，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空间的组织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载体，空间本身便是政治性的，社会转型带来的苦难直接作用其上，而城市规划作为学术与专业的便是对城市病魔的一种反应（霍尔，2017:7）。在《明日之城》中霍尔对城市规划思想史作出详尽的梳理，然而何种意义上能够实现发展与公平、塑造普遍美好生活的理想却依旧在未完成之中。

欧美城市在上世纪中叶已形成极大规模，现代交通与卫星城方兴未艾，人口与区域区隔业已形成。纽约建筑师罗伯特·摩西试图以景观大道系统的方式实现他心中公共精神的理想，却在格林尼治村受到激烈的抵抗。对于长期浸染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者而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自下而上”的“在地视角”的书写在接触时是颇具诱惑力的，她激烈地抨击规划师自我中心与形式主义的计划，以及概率统计的调查充满炫耀以及设计师居高临下的态度。捍卫街区原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行道、街区公园的活力与安全保障。她雄辩地指出“隐藏在城市规划者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城市——的极其不尊重现象的背后，潜伏在那种认为城市是非理性、不可理喻和不可预测的幼稚信念背后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关于城市，实际上包括城市人本身，和自然的关系的曲解”（2006：407）。然而在何种意义上，来自记者的、对城市规划自言自语中诞生“伟大正统的理论”是值得受到批判的，又引发什么思潮，构成何种危险？这是阅读中笔者较为关注的问题。

**二、城市规划的演进：走出梦魇到光明之城**

**走出暗夜**

当城市规模随着生产革命的进展在大西洋两岸率先急速膨胀时，多重社会恶疾和潜在政治动荡犹如徘徊的幽灵。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揭示的社会失范与解体与城市过度拥挤密不可分，不论是伦敦、巴黎还是柏林，在1880年后呈现出显著的“城市恐惧症”，纽约分租房的居民挣扎在黑暗、通风不良的房间中，与危险与高死亡率相伴，而城市“是肮脏的，也是闪亮的，你最好远离她，而不是享受她”（霍尔，2017:30-34）。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在此时兴起，而城市规划如马尔库塞指出的依旧站在“房地产利益者与中等收入家庭投票者”之间。

转机在20年代上半叶出现，不论是田园城市的理念，还是城市美化运动建设纪念碑式的城市与柯布西耶式的光明之城的尝试，都致力于扭转梦魇之城的局面。

铁道的诞生实现时间的工业化与空间的压缩，人们遭遇新的生命境况。霍尔指出长期以来对霍华德田园城市构想的误解，实际上他试图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合作公社的形态，在田园郊区建立人口密度并不低的自愿的自治社区，然而被长期误解。依照霍华德的方案，通过包括工程师、建筑师、医生、金融家等各行各业的组织构成自由与合作的蓝图，唤起城市的绝望，并把家庭住宅精神带到工业化的英国（霍尔，2017:89-91），莱切沃斯与汉普斯特德成为实践的案例。但田园城市的设计理想在传播中被不断稀释，不论是西班牙的阿图罗·索里亚玛塔的线性城市构想还是法国与德国的同僚托尼·戛涅和特奥多·弗里希，在社会改造运动的目标背后都带着其自身的设计理念，最后使得其最初的理想在田园的外壳中消失，自由工艺者的共同体和传统的合作式生活也难以窥见，而“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后工业化的社会现实最终摧毁了它”（霍尔，2017:139）。

**美化与独裁**

如果田园城市是规划的设想无法现实，而城市美化运动中所产生的纪念碑之城和塔楼之城可能更是对“美好生活”的背离。在奥斯曼巴黎改造和维也纳环线以降，美国在“不做小规划”的缔造者丹尼尔·伯纳姆完成了1909的芝加哥规划，这座城市遭遇的地震或火灾恰正提供一块白地，给规划者傲慢地实现一种和谐社会秩序与纯粹美学混为一谈的设计以可能。然而当他描述了伊利湖畔别具一格的城市时，伯纳姆式的规划中以商业设施为中心的“崇高公共关系”的实现究竟为了谁？梅尔·斯考特批评到，他所规划的芝加哥成为“一个不为美国所知的历史城市，一个为了商业王子的贵族城市”（霍尔，2017:190-196），倘若失去浮华阶级也便难以为继。

规划者的理念没有扎根于他所相遇的土地与土地上原生的民众确然成为更值得反思的问题。英国殖民者的德里规划，试图塑造一个“盎格鲁-印度”，以彰显象征权威和统治的纪念性空间；同样在英属东非、南非的各个首都同样在白人基于卫生学的规划之下，接受与加强种族隔离的现状，因为“非洲人被假设是不存在的，他们被设想为农民，或者通过驱逐被赶入保留区”（霍尔，2017:203）。而回到欧陆，法西斯力量与独裁政府也试图通过城市规划塑造礼治空间，比如墨索里尼主政的罗马，试图建立象征性的高塔，试图“在罗马式的地标平面上树起中世纪的轮廓线”，通过扩展街道以强化庆典功能；纳粹的柏林重建计划中，施皮尔成为“不小不做”的继承者，布置宽阔的轴线与穹顶和拱顶建筑，以重塑德意志的自尊。（霍尔，2017:211-214）。为建构民族自豪感的努力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样盛行，他指出“建筑必须是印象深刻的、具有代表性的、雄辩的。每个建筑无论在功能上如何朴实，都必须具有纪念意义”（霍尔，2017:216），于是希特勒的方法在莫斯科实现结构主义式的对应：穹顶大厦成为配以巨大列宁塑像的苏维埃宫，而宽阔大街遮蔽背后巨大的贫民社区。

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理念与纪念碑式的美学改造具有高度亲和，体现出的特点便是对地方进行塑形时以政府、民族、抑或审美理念进行筑造，而忽略城市本身的居民何以栖居[[1]](#footnote-1)的可能。这正如奥斯卡·纽曼对柯布西耶模式的批评：“建筑师把每一栋建筑作为一个完全的、独立的和正轨的物体来进行考虑，而对于地面的功能性使用，以及一栋建筑与它可能与其他建筑共享的地面之间的关系则不加考虑”（2017:262），在这种理解方式下，建筑是以一个筑造“物”作为本质（entity）的存在，但是某种意义上，物是与行动者相互定义的[[2]](#footnote-2)，如果构成城市的种种地方（place）仅仅是物质的，那么也只是一个区位（location）而已，却难以和甚至其中的人发生更多情感上的关联，不会形成一种人与土地之间的依附与认同（Cresswell, 2004）。在巴黎以24座塔状建筑坐落在1200英亩土地上的光辉城市的方案中各阶层分隔居住，公寓批量生产而丧失个体特征元素；他为分治后的旁遮普邦设计并落成的昌迪加尔市中，布局的建筑优先考虑视觉象征主义与美学形式，却与印度人口的问题与生活的丰富性无关，考虑纪念碑的空间形式，却无视“空间”在居住者日常实践中关于情感与身体的意涵。城市美化运动的后续，如巴西利亚的建设也同样面临人口的隔离，穷人被宏大景观排除之外，也无法“破坏”或体验。

其中最为失败的典型是普鲁伊特-伊戈面临的动荡，这个高度柯布西耶式的设计是闭门造车的登峰造极之作，33栋11层提供给黑人的公共公寓，随着时间的推进入住率下降的同时是犯罪率的极具提高，忽略人与空间关系的规划设计带来灾难性后果。基于这些规划“传统”造就的争议案例，城市美化运动与重建遭到以雅各布斯为典型的集中反对，而这些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言之拓宽了城市设计的思路：改变公共的大型机构为民众建造，政治不再天然作为资助与建造者，而是成为促进与协调者，并且接受这样的观念：人民为自己建造（霍尔，2017:9, 271）。

**三、另一种路径：无政府主义的可能与危险**

为了打破规划师与建筑师的独裁，渐渐演变为对自上而下规划的普遍觉醒。民众开始捍卫自己的街区，普通人开始为创造并改善自身居住环境努力，以捍卫社区的丰富性与本真性。延续着田园城市的可能性，在60年代后走向一种更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建设思潮，比如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的设计中包括大量居民自建的元素，而这类技术自由主义、农村主义、自然主义的思考甚至与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不谋而合；在“第三世界”中的自建住房实践中，巴西“希望的贫民窟”中依旧有良好组织，文化上高度乐观并且“具有中产阶级的热情”，利马平民社区中通过房屋所有权获得建造与改善的可能；但尽管如此，也有学者认为自我改善的效果依旧高度可疑，尤其是“那些缺乏组织、拖沓、劣质建造、缺乏大规模生产的地区”以及“安全与健康危机”（霍尔，2017:280），在这个意义上，放任自由与顺其自然的背后是好地方会一直好，而坏地方也难以改变。

自下而上的力量也体现在城市更新中，然而危机也在格林威治村抵抗的二十年后体现。霍尔指出虽然雅各布斯的“药方”听起来很好，然而“正如人们在20年后所指出的，讽刺性在于其结果就是城市的雅皮士化”（2017:261）。这一过程伴随着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比如美国在去工业化和石油危机后内城的普遍衰败与高收入阶层的外迁持续到特定节点，婴儿潮进入劳动与购房市场后，交通与地租曲线重新调整，资本向内城回流，那些雅各布斯心中神圣的街角杂货店被中高档的连锁品牌取代，她描绘的浪漫化的社会环境在失地者的抗争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付之东流，并且置换出内城贫困群体与少数族裔而引发失地的苦难（史密斯，2018）。

因此刘易斯·芒福德指出这种“自下而上”的城市主义与将城市视为白地的现代主义的规划路径同样可疑：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她虽然注意到是资金和国家权力作为结构性力量在建构这些街区，却不曾意识像她这样的高学历与收入人群也“在没有国家协调规划的情况下，推动开发商实施高风险、大规模的项目”（佐金，2015:268），正是资本回流带来士绅化的动力，以资本利益最大化破坏了社区自身的使用价值，而她直接将谴责的对象推给进行规划的公共部门。

然而雅各布斯对城市社区“本真性”的捍卫却确实推动了城市规划的新的取向，随着地理学的人文转向，规划师们也不再那么关注图面局部与美学象征，从一种纯粹设计转向更为系统与理性规划，关注文化面向的方式。作为一种民主表达的方式，民众对傲慢的国家机器报以警惕，然而在多大程度上就如同当时兴起的女性解放运动一样，走在抗争前列的仅仅是代表着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与视野的局限是值得反思的，同样捍卫社区的本真性的运动中难以洞见被隔离在外者的声音。而一旦“倡导性规划”逐步让位于“激进的民主”以追求一种意识形态合法性或从底层攫取权力，却讽刺性地激化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某种意义上，单纯以地方主义与自愿主义取代国家主义是具有危险性，即如果像雅各布斯一样始终以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批判质疑是否城市能够借助理性的规划变得更好，那么如吉登斯所言“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大家都停止思考”（霍尔，2017:376），而真正的城市实践也无法展开。

**四、尾声：百年以来的城市与明日**

在《明日之城》的末尾似乎议题兜兜转转回到原点：城市规划从19世纪的欧洲梦魇之城中诞生，怀着提供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人在城市、城市边缘、乡村之间的空间中塑造种种可能性，其中有过规划师图纸上的设想，也经历从自上而下而自下而上的抗争与转型，后现代理论的批判与对其的再反思，但城市发展中各阶层居民的生存质量的差异依旧迥异，同时城市拥挤、面积扩张基于环境更大的压力。人在空间中的扩张过程，邻避主义的阴影之下是正义；在城市内部，边缘与中心之间的社会排斥同样存在，不幸的群体所在城市却在教育与就业机会之中难以找到一条离开暗夜的道路。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到雅各布斯对摩西的宣战，其实不论是占据话语的中产阶层还是规划师，他们本身都是以权力之光的方式存在，在规划与发展过程中，投射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土地上；而形态与空间生产过程本身也是规划者与在地生活者之间权力关系的缩影，而正义的地理学便由此展开。半个世纪前的争议，随着线性时间的演进，成为“第三世界”面临的困境，寻求出路自然需要一种“在地视角”，但也仅仅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的人与地之间的温情，背后更存在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争夺。“城市底层阶级的问题，它就像门外等候着的一群阴郁的、愤愤不平的民众”，边缘和隔离以更为隐微的方式存在，而在其中的抵抗的每一种声音，也值得去洞见其所站立的位置与其所表达的利益，并且对于知识与实践的生产者，也需充分意识到城市设计思想本身便是一种知识与权力。

**参考文献**

彼得·霍尔，《明日之城：1880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童明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

莎伦·佐金，《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丘兆达、刘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尼尔·史密斯，《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李晔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Cresswell, Tim.《地方：記憶、想象與認同》，徐苔玲、王志弘譯，台北：群學出版，2006年

1. 筑造视角（building perspective）和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的讨论可参见Tim Ingold.(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pp172-188. [↑](#footnote-ref-1)
2. 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中指出每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每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结点，共同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每个节点都以主体存在，没有主-客，人-物的区分，形成一种相互认同、依存与影响的主体间性可能。 [↑](#footnote-ref-2)